

北洋軍閥與南京統治的前途

鄧演達先生遺著

重印鄧演達先生遺著序言

鄧演達先生遺著原本，是一九三二年間在上海出版的。當時收集從一九三〇年五月間鄧先生歸國之日起，至一九三一年八月間被捕之日止，所手寫的政治主張，歷次在「革命行動」雜誌所寫的文章及各種宣言等十四篇文章。鄧先生全部遺著應該包括一九二五年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報告「世界革命與國民革命」的演詞，一九二六——二七年在武漢所發表的文章及各項演詞，尤其是「我們現在應注意的是什麼」？和「我們現在應注意的又是什麼」？先後輝映的兩篇文章，以及討論到各項問題的函件等等。當時因環境惡劣，無法收集，只得付諸缺如，實在是不勝遺憾之至。

一九三九年在香港出版「鄧演達先生遺稿選集」，是根據上海版中選擇出來付印的。先後付印過兩次遺著，不下六千冊，二十年來，流傳海內，是極得珍視的。可是，在十餘年的內戰和八年抗戰當中，本黨同志承繼着鄧先生的精神，接受了鄧先生遺教，始終是站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的正確立場，與一切惡勢力——從反動的南京統治，封建殘餘勢力，帝國主義及買辦以至日本

竊盜——搏鬥，所遭遇的艱難困苦，所懷抱的光明遠大，略行苦幹，罕有寧處。同志們的犧牲損失已多，所藏之典籍文獻散失更不可勝計。因之兩次所印遺著，寥寥無存。在天旋地轉人民大翻身之日，鄧先生當年所理想、所祈許的局面，逐漸實現。鄧先生之政治先見，得到事實上的證明，益足令人折服不置，重印遺著供大眾的參詳，作同志們的實踐指導，是刻不容緩的。鄧先生的全部主張在本遺著內可窺全豹。鄧先生其人及其思想輪廓，在重印本遺著當中，作簡單敘述，是有助於了解其主張。

鄧先生對於中國革命有深刻，切實的認識，提出了具體的政治主張，他從中國的社會結構作詳盡分析，指出當前的中國革命：「是一個複雜性的一種革命，具有民族、民權、民生三種革命性而以社會主義為歸宿的革命」。因此主張：「要澈底的肅清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使中國民族完全解放，一定要喚起並組織廣大的民衆，使其覺悟的參加反帝國主義的鬥爭」。「並且應該與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階級聯合起來作爭鬥的同盟」。及堅持「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的孫中山先生遺囑。他主張：「農工平民羣衆要取得政權……去推翻千餘年來傳統的官僚政治。過去的換朝與革命，都只是新舊的封建統治的交替。」同時：「要實現社會主義，一定要在以直接生產的工業為重心的平民政權確立以後，運用政權去發展生產，使生產組織化及社會化」。他堅決的信仰這種主張，認為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唯一途徑。他

號召全國農工平民羣衆起來解放自己，解放中國，他領導全黨同志們身體力行去作實際鬥爭，他個人更是「艱苦卓絕」「奮不顧身」的去求實現主張。

一九二六——二七年武漢大革命時期，他很透澈的看出中國革命非有廣大的農民實際的參加到革命行列，不能保障革命的勝利，同時并指出解決土地問題爲農民參加革命的先決條件。一九二六年冬他寫了一篇「現在我們應注意的是什麼」的長文，在報上發表，主要的就是提出解決土地問題，實現「耕者有其田」的主張。他爲着要使當時在武漢的工作同志了解土地問題的重要和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特別請有解決土地經驗的蘇聯同志，來講解蘇聯解決土地問題經過詳情。當時因工作忙碌，白天沒有時間，每每在晚間召集座談。鄧先生於百忙中每會必到來主持，問題複雜而繁重，常至深夜始散。與會諸人因白天工作繁忙多感疲勞，鄧先生獨精神奕奕，提示精警遇有重要關頭，必遍詢在座各人意見，親筆記錄，綜合成結論。他用洪亮聲音指出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說：「在政治上是摧毀封建勢力，在經濟上是改良生產，使國民經濟向前發展」。對於農民問題的重視和扼要的指出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是最足珍貴的。

一九二七年春間革命陣營裏起了變化，以蔣爲首的一羣在南昌計劃背叛革命，鄧先生曾向蔣苦口進告，唇焦舌弊，知不可藥救，臨行前復與蔣作竟夕談，力爭解決土地問題，以挽回革命危機，蔣終不悟，而鄧遂絕裾而去。「壯士斷腕」的精神，表現對革命的英勇和忠實。

一九三〇年五月間鄧先生從海外歸國，再次從事於實際革命鬥爭，生活刻苦，無可倫比。盛夏閉戶作文（當時鄧主辦「革命行動」雜誌），所居又湫隘不堪，赤膊赤足，汗流滿背，不揮扇亦不取涼，旁置麵包數片，隨食隨寫，似乎不知有大暑天。同志中勸其稍作休息，則稱：「尚無所苦」。他常常說生活不應該和農工平民大眾相差太遠，不止在目前要有勞苦平民生活的鍛鍊，即在將來革命進展到獲取政權時，我們革命者的生活標準，一樣不應提高。假若我們不能把自己生活標準與一般勞苦大眾拉平，則腐化，貪污以及脫離羣衆的結果，必不能免，革命亦必不能成功，並且根本失却革命者應有的修養。只有農工平民大眾生活提高之後，我們的生活才有提高的權利。他認定刻苦是革命者的「倫理」。

鄧先生最討厭那朝三暮四的偽善者，他特別指出汪精衛那種變幻無常，軟弱無能爲可恥。他常常說忠實於自己主張，言行一致，雖失敗也不失爲「殉道者」。他比喻自己是一匹負重的驢子，在漫漫長途中行進着，也許有一天背負着重担，倒斃在路傍。孰料竟符語讖遭反動派毒手，負着重任，中途倒斃。

一九三一年鄧先生在上海因工作活動的結果，反動的南京統治必欲置之死地，特務密布，環伺左右，鄧先生深知危險，本擬往海外稍避耳目。有一次已經購好船票來香港，後因事不果行，復留居上海，竟爲南京特務勾結租界當局所捕獲，即移交南京，八月間被捕，十一月底遇害。

鄧先生被捕入獄，南京當局威迫利誘意欲鄧先生放棄主張，結果凜然不可侵犯，毫不爲動。同時被捕的有十餘位同志，在獄中同樣的大節凜然。某次將此事告知鄧先生，他沉着臉說：「苦了我們同志」。

鄧先生在獄間有字跡傳出，大都用紅鉛筆寫在草紙上，除勉強在外面同志工作外，多爲索取書報之語。最後一次傳出之字條僅寫着：「現移南京城外炮壘中，今後恐不能通一字矣。」寥寥數語，竟爲訣別之辭，傷已！

鄧先生以至大至剛的革命精神，力行轟轟烈烈的革命事業，同時又是受過由陸軍小學而中學而保定軍官學校的嚴格的軍事訓練，加上他那種魁梧奇偉的體魄，龍馬不羈的精神，在想像中是會以爲一位剛烈不過的人。其實鄧先生除開生活嚴肅，不苟言笑之外，與人接洽和治事，總是和藹可親。他在工作繁重時精神非常緊張，表現出「沒厲無前」的氣概，但祇覺得「威而不猛」，仍然是很可接近的。與接談問題總是「滔滔不竭」，「頭分縝析」使人樂於接受。在接談中偶爾間加入一二幽默語句，使人莞爾，助長談興。對人接物，態度誠懇，更是與接觸過的人們所稱道的。

鄧先生出自農家，父親到是一位讀書人，還是前清的秀才。在邇清末葉內外憂患環生的時期，頗寄望於他的兒子，家庭教育頗爲完善。母親是一位慈祥婦人，偉大的母愛，常常引起鄧先

童年年的回憶。由於和愛的家庭生活以至由陸小而部隊的團體生活，三十多年時光淘養出對人類偉大的愛。另一方面却非常憎惡那些吸人膏血的剝削者，壓迫者，咀咒他們爲臭虫虱子。他爲早年離開家庭過着團體生活，接觸事物非常的多，由於他的聰明知慧，體會出社會上各種形態，這即是所謂懂得「人情世故」。他最看重友情，他認爲他的朋友都是出入生死的戰友。對於舊社會的禮教道德，他指出片面性的禮義廉恥——下對上的一種義務，應該加以改造。只有流行在下流社會的那種俠義精神，還可以提倡。他對於朋友間的交誼，不單正在事業上以道義相勉勵，緩急上通有無，而且在死生危急當中，挺身赴難。在戰場上他英勇的照顧袍澤戰士，如十二年肇慶之役在火線上揮軍搶救陳誠（當時陳在鄧部主任連長，受傷不能行動），同年在東江戰役從火線上抱着受傷的某營長，血淋淋的離開火綫。這些都是在萬分危急時候，捨己救人的至高道義。至於撫卹照顧烈士遺族，更是仁至義盡，這些都是事實，有很多人都知道的。

在左朋，同志間的來往，最喜歡傾聽他人意見，偶有不同意見以至爭論時，鄧先生必反覆辯證，不厭其詳，從無疾言厲色，使人屈從已意之意圖。雖然每次觸問題，尤其是政治問題，鄧先生很少放棄他自己的意見，但從事實與理論的證明和闡發，使人心悅誠服，從不採取教條，訓令形式，埋沒他人意見，勉強他人接受。

私人來往，周旋進退，「娓娓深談」，「載言截笑」，天真活潑，幾忘人我。朋友中偶有困

難，有所求助，無不力謀解決，寧誠懇切，體貼溫厚，每使人覺得人間友情之可貴，刻薄寒澆的世風，他給人間以溫暖。這點是和他相識，和他交手的朋友們所樂道的。

鄧先生的思想根源是出發於歷史唯物論，這點在一九三〇年夏在上海舉行結黨式時候，特別提出的主要信條第一項，標明：「我們哲學根據是歷史唯物論」。他從這種思想出發點觀察世界，觀察中國，觀察萬事萬物，確定了他的人生觀，世界觀。從他手寫的「我們政治的主張」以及其他論文，處處都可發現他的思想根源。對於中國社會分析完全運用歷史唯物論的觀點——唯物史觀去斷定：「中國現時的社會，在形式上固有異於古代的封建制，但，就其內容的性質而論，的確還離不了封建勢力的支配，因此，整個的中國社會，還在封建勢力支配階段，還是前資本主義的時代，同時又因為帝國主義勢力支配中國的緣故，使中國社會益呈複雜的狀況。這兩重支配都是中國社會不能向前進展的大障礙」。他不單止運用這觀點去觀察中國現社會，他還觀察到中國社會所存留的各種學說，思想，各種社會現象，社會病理。「他認定中國現階段的革命」是帶着民族性的「平民革命」，但中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有其不同點，即中國無比較發達及自覺的人民（資產階級包括在內）因此，中國革命性雖為民族解放的廣大運動，且為破壞封建殘餘的民主革命運動，然却不能為資產階級所領導。中國革命又不同於俄國十月革命，因為中國無廣大的自覺的產業工人，無法建立無產階級獨裁的革命政權，應該是農工及其他城市鄉村的被壓迫剝削

者的革命，但却帶着非常濃厚的「社會革命」的色彩。因此，這種可以叫做「農工平民」的「民族革命」。不過這個「平民」的涵義和舊時代僅與「貴族」相對待的解釋，並不相同，凡自食其力而不剝削他人，却直接參加生產的近代工廠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僱農、設計生產者、管理生產者、以及担任運輸分配者、和其他輔助社會生產的職業人員，而現時又是被政治勢力所壓迫着，統稱之爲「平民」，換言之，也就是以農工小資產階級的聯合，作階級鬥爭的同盟，以爭取政治，經濟的解放，求得民族的獨立和自由。」鄧先生是依據着歷史的觀點，指出當前的任務，和歷史的前程，其正確性自然要歸功於他的研究社會現狀的方法論。

鄧先生對於中國現在還殘留着的如老莊的玄幻虛無思想，孔子的中庸愚蒙思想，耶穌的妥協調和思想，佛教的厭世虛空思想，都所深惡痛絕。他要把禮教和庸師宿儒紳士道學家者流一概摧陷廓清，把孔廟，貞節坊，祠堂，廟宇一齊掃除干淨，而代以新的「人」的，社會的，樂觀的人生觀，社會觀，使男女同胞一齊都衝出目前這個中國的黑暗地獄，跑上新鮮活潑的大道。

對於歷史的研究，鄧先生似乎特別注意。他主張史的研究，尤其是世界通史的研究，有了史的研究，才曉得世界的由來，才曉得世界各部的相互關係（一定要站在社會的觀點上研究，才能適合於要求）。中國近代史更是切要，因爲一切社會變遷的條件，都是在最近百年內才急劇的發生和變化的。研究歷史不單止可以曉得已往的成敗得失其原因及其結果，並且可以曉得歷史的行

程，由何處來往何處去。此外對於經濟史的研究，認為是確實說明現世界各國的實際狀況，與其由來及其客觀的要求。對於經濟學的研究，認為是說明現時人類社會的生活要求，及其要求的法則。對於政治制度，各國政治的研究，也認為很是重要。從歷史的由來，指明歷史的去路，鄧先生把握着這點，所以常常說「歷史的任務」，或「歷史所賦予的使命」。鄧先生是想促進歷史行程，使中國早日達到獨立，自由，民主，康樂的中國。

鄧先生最光輝最寶貴的精神是酷愛真理力求實踐，尤其重視批判的精神。所以在無間斷的鬥爭與無間斷的求知中，不僅能堅守革命的原則；而且能不斷批判・前進・創造。當北伐軍途中，鄧先生即警惕到革命陣營中軍事獨裁的危機。在武漢政府時代，從羣衆的反帝反封建運動的開展中，實際批判了資產階級革命與妥協的雙重性。因此對中國革命基本問題，他是打破了國民黨的傳統觀念，把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加以嚴肅的批判而求其發展：第一明確指出民族民主革命的階級基礎，把扶植農工的觀點發展爲農工中心的觀點，揚棄了階級協調和全民政治說法，完全採取被壓迫階級聯合向壓迫階級進行鬥爭的方針。從而確定革命政權的性質是民主聯合的平民政權；第二・確定實行土地革命，發展國家資本，容許私人資本在一定限度內的自由發展，作爲走向社會主義過渡階段的經濟政策，並確定實現社會主義爲革命的前途；第三・對於反帝國主義的鬥爭，確定聯合世界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階級的總方針，聯蘇政策是其中主要一環。這都是鄧先生

革命精神之所在。他以這種判批的前進的革命精神，繼承孫中山・朱執信・鄧仲元・廖仲愷・諸先烈的革命遺緒而超出於他們的向前昂進，負起革命階級聯盟的重大任務，從發動黨內革命鬥爭到組織第三黨，給國民黨反動陣營一個致命的打擊，增加了以中共爲首的左翼陣勢，加強了整個民族民主的革命力量，這些革命的業績就是構成今天中國人民大勝利的因素。如果只看見鄧先生生前的赫赫功名，崇拜他的英雄氣魄，或者認爲他是超人的人，當他的主張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教條，都是沒有懂得鄧先生革命精神之所在，這樣去崇拜他恰恰是違反他的精神，惟有最能學習他在革命實踐中批判，不斷揚棄陳舊的東西，不斷補充新鮮的東西，隨着時代前進才是真正認識鄧先生崇信鄧先生。

鄧先生正在壯年，遽爾殉難，春紅夏綠，電碎霜凋，其損失是不可補償的。然而他的正確主張，他所手創的黨，他所領導的工作同志，依然遵從他的遺志，繼續前進，繼續奮鬥。今天中國的新形勢已經到來，殘暴的無恥的舊統治宣告結束，廣大的人民，覺醒的英勇鬥爭的成果，將產生在現實的，合理的國家，社會的建設上面。我們謹以摯誠告慰鄧先生及其他死難同志諸先烈之靈，我們堅決的在新中國建設下完成使命！

陳卓凡

一九四九年五月作於香港

楊逸棠

鄧演達先生傳略

繼承孫中山先生中國革命的使命，站在廣大的勞苦的農工平民大眾的立場，革命領導者鄧演達先生，於民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被反動的南京統治——主犯蔣介石及其同僚走狗——所殺害而與世長辭了。先生盡瘁於中國革命，一生艱苦奮鬥，不避勞怨，其對於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正得到結論，領導農工平民羣衆與反動的統治者開始鬥爭，無恥的殘酷的敵人在它挽救沒落的途徑中，竟用卑鄙的手段，戕害了中國垂危的民族生命象徵！在先生爲中國革命而犧牲，爲民族解放而犧牲，是算盡了責任，而他的一生革命事蹟，却是革命後死者的典式，他的革命任務，却待革命的後死者去完成！爲着永留後蹟規範；爲印證中國革命的途徑，爰述先生事畧如下：

一 革命的童年

先生諱演達，字擇生，廣東省惠陽縣永湖墟鹿頸鄉人。先世是由梅縣丙村遷居該鄉，世業農。兼作永湖淡水間船夫，到了他的父親鏡仁先生開始讀書應考在遜清光緒年間考取了秀才，爲人曠達豪邁，老而彌堅。母親葉氏，是本鄉一位慈祥親切的農家淑女。兄競生是一位純粹的軍事家，專以技術上爲國家服務的。夫人鄭立貞女士亦是同鄉農家淑女，在舊禮教下所結合。伉儷間的生活極機械，平淡，却絕少遺言。先生生長於農村家庭，賢明的父母在幼年時代所給予的教育，使他向上的激勵。從小生長於農民區域中，對於農民生活狀況，殊爲了解。其故鄉組織地主與佃戶，分區而處，有所謂地主區，又有所謂佃戶區。地主與佃戶間的界限極嚴，因此地主壓迫佃戶的現狀，遂層見疊出。加以地主區的人們，豐衣足食，優遊餘裕，而佃戶區的人們則胼手胝足，鳩形鵠面，苦樂的懸殊特甚。先生適生是鄉，童時對於地主的橫暴與佃戶的困苦的印象甚深，遂構成先生的農民革命及土地改革思想的最原始的基礎。先生出世，適當中法戰爭和中日戰爭之後，當時國人受二次戰敗的創傷，對於國際地位以及中國的國勢，已漸漸明瞭。且適值革命運動，活躍甚烈，革命黨人時常將中國國勢的凌夷與帝國主義的侵畧，向農村方面宣傳，先生耳濡

目染，遂又種下先生民族解放與反抗帝國思想的胚胎。當時先生已獲得了革命的基礎，又因與革命運動接觸的機會極多，風起雲從，慨然興嚮往之志。清末幾次的革命黨人在廣東起義，尤其是在惠州一役，使這位年幼的農村兒童，對革命，戰鬥，犧牲，的事蹟，感受到很大的刺激。又因在中法，中日戰爭之後，先生習染於革命黨人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富國強兵的思想，所以年稍長即志願做一個為國家民族服務的軍人。這就是先生學習軍事的動機。

二 早年的軍事教育

先生於十四歲那年（民國三年）入廣東陸軍小學。清季編練新軍，需要大批軍事幹部，在各省設立陸軍小學，考選各縣青年入校訓練。廣東於光緒末年設陸軍小學於廣州附近之黃埔，先生入校為第四期學生。軍事機構為當時革命黨人所重視，滲入該校傳播革命種子，以鄧仲元先生主持其事。先生在校為同學中年事最幼者，而聰穎奮發，每試輒列前茅，為師友所驚奇，鄧仲元先生尤所器重，獎飾不已。辛亥革命陸小同學大都參加革命行列，先生亦隨北伐軍出發，在姚雨平總司令部任職，初露頭角。南北議和，民國建立，所有參加革命工作之陸小學生，回粵重修軍事，或派往外國留學。先生派往陸軍速成學校，於民國二年畢業。民國三年進武昌陸軍第二預

備學校，除軍事科學之外，稍稍涉及經濟，政治諸科學的研究。當時中國政治在袁世凱的軍事統治下，黑暗落後，社會窒息。中間經過袁氏稱帝，北洋軍閥的跋扈專政，政治愈加黑暗，經濟愈加破碎。先生目擊當時情勢，不勝憤激，擬棄其所學從事工商業，屢屢寫信給他的父親，痛陳國事日非，慷慨激昂，放言救死圖存之道。父親溫慰有加，勸畢所業再報效國家。民國五年冬預備學校畢業，升業於保定軍官學校。在學期間研究軍事科學之餘，輒致力於社會科學的研究。民國八年，畢業於保定軍校，被派赴邊防軍入伍見習，充下級軍官，時先生年僅二十四歲。

民國五年討袁之役，廣東方面驅逐了袁氏羽翼龍濟光，舊桂系陸榮廷入粵，把持軍政。陳炯明率軍二十營，不容於粵省，奉命援閩，入漳州，據有閩南十餘縣，與北軍對峙。時鄧仲元先生在陸部任參謀長，振軍經武，力謀以此區區部隊作革命武力。聞先生已畢業軍校，急召回勸助。先生奉召問道南下至漳州，與仲元先生暢談竟日，對於振軍之道貢獻已見，仲元先生深許之，乃組織憲兵，使先生統率，於是先生脫離學校生活而致全力於革命事業了。

三 初期的努力

民國九年孫中山先生命陳炯明由漳州率師回粵，驅逐舊桂系。先生亦率領憲兵隨軍出發。并

組織督戰隊由先生任隊長，出入火穽，激勵士率。淡水一役，回師之粵軍爲林虎部桂軍所阻扼，無法進展。先生乃獻間道出河源直搗惠州，抄過淡水之計，鄧仲元先生深是之，加兵出河源，先生亦督率戰隊參加河源戰役。由於士兵奮勇，擊破河源守軍，直趨惠州，淡水之桂軍，倉皇引退，回粵乃竟全功。廣東恢復之後，鄧仲元先生成立第一師，先生卽任師部參謀兼步兵獨立營營長。團結上下，羅致人才，仲元先生倚如左右手。當時在粵之軍隊，統屬於陳炯明指揮，隊伍龐雜，思想腐敗，紀律廢弛，封建氣息尤爲濃厚。如此之武力去負担革命，自然是不能勝任，并且還要壞事的。當時孫中山先生已回粵，觀此現狀，深知不能負担革命，此意仲元先生最爲了解，乃致力於第一師之創建。先生深知仲元先生之意向，仲元先生亦深知先生之能力，經營肇劃，不遺餘力，同心合力發展第一師，鞏固革命基礎，發揮革命機能。不久，先生又受命組織工兵營，悉心經營，努力訓練，全營精神奮發，起模範作用。時間和人力的累積，第一師已漸漸的具有基礎。當時孫中山先生的政治理想和推進計劃，爲陳炯明所不了解，漸漸的發生矛盾。鄧仲元先生週旋其間，彌縫調解，煞費苦心，但終於不能挽救，而反遭陳部反動軍人之刺殺。這是代表兩種不同勢力——新興的革命力量和封建殘餘勢力對立，矛盾的暴發。當時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發展計劃和陳炯明的封建割據主張，兩不相容。第一師在粵有左右局勢的力量，尤其是對於革命方面多方維護，怨忌叢集，消滅第一師的陰謀，是時刻存在着的。行刺鄧仲元先生的舉動，乃是陰謀的第

一着。仲元先生被暗殺之後，先生悲痛領導同志之慘死，革命危機之暗長，報仇與鞏衛革命，唯有維持第一師的存在，努力團結振奮軍心，使不發生動搖，保存此革命的武力基礎。

四 革命的護持者

民國十年孫中山先生率師北伐，假道廣西，進駐桂林。原議陳炯明率部留粵，維持後方，供應餉糧。到北伐出發之後，陳氏違反原議，攬權跋扈，扣押餉械，使北伐軍不能進展。孫先生乃由桂林回粵，重行布置，當時叫做「改道北伐」。孫先生回抵廣州，陳氏退居惠州。第一師因先生之斡旋，首先擁護孫先生北伐主張，全部出動，參加北伐。民國十一年先生隨軍出發，經始興、南雄向北推進，前鋒已過贛州。先生指所部官兵營英勇作戰，首先進入贛州。正在待命前進之際，廣州方面忽有粵軍將領請孫下野之事變。以葉舉爲首的粵軍圍攻總統府，宣稱「請孫下野」，孫中山先生幾及於難。事變之後，北伐軍事奉孫先生電令回師戡平叛亂，許崇智率第二軍及李福林部爲前鋒，由贛回師。師次韶關，爲陳部粵軍所阻，不能前進。第一師內部上層份子，惑於謠言，發生動搖，幾無法維持，先生乃急會同陳銘樞部第四團，問道由信豐退據河源。當時交通阻滯，真相不明，先生乃潛赴香港轉上海，見孫先生請示善後計劃。孫先生告以保存實